

文革博物馆专集（二）

(CND-CM)

—— 增刊 第七十八期 ——
(一九九六年三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9603a)

1.【编者的话】		
2.【文献资料】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附中红卫兵
	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附中红卫兵
	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附中红卫兵
3.【我看文革】	读《打老师的革命》有感	丁 白
	文革是什么	谢 友
4.【往事追忆】	疯长	王小京

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华夏文摘》或CND的观点。

编者的话】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以下是本博物馆收集到的第一批展品中的一部分。我们热诚欢迎读者们继续将你们在文革中的经历和感想送到博物馆来与大家分享。本刊将分期在增刊中陆续向大家展出你们的贡献，并且逐步把这些展品陈列到 C N D 万维网的 `h o m e p a g e` 中去。

作为一个博物馆，其收藏当然应以文物资料为主，这正是我们目前深感困难的地方。文革期间的资料，大量的以大字报、油印和铅印的传单和小报形式流传。其中有些文章、讲话（如广州李一哲的大字报）对群众思想和运动发展的影响，并不亚于官方的正式文件和报纸。然而，这些材料恰好又是最不易保存收藏的。加上各种人为的原因，它们今天即使还没有完全“灭绝”，也已经成了“稀珍物种”。因此，我们特别欢迎读者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或信息。正如《文革博物馆之梦》一文所说，西方的大学和其它学术机构里，反而保存着一定数量的这一类材料。我们的许多读者都在这些机构中学习或工作，本刊希望你们在工作学习之余，能够帮助我们寻找、搜集和输入有历史价值的材料，使我们的馆藏一天天丰富起来，为后代留下一份珍贵的遗产。

□ 本刊编辑部

~~~~~  
【文献资料】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很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有些大胆的反反对造反的人，今天突然变得忸怩起来，絮絮叨叨，吞吞吐吐。什么太片面了呀，什么太狂妄了呀，什么太粗暴了呀什么太过分了呀。

这统统是谬论！要反对就反对，何必羞羞答答的呢？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片面了吗？你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全面呢？看来你们的全面是“合二而一”，是“折中主义”。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吗？我们就是要狂妄。毛主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不但要打倒附中的反动派，我们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不“狂妄”怎么行呢？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的残忍！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就是“和平过渡”。这是妄想！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还有些人，对革命害怕得要死，对造反害怕得要死。你们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缩在修正主义的蜗牛壳里，一有造反的风声，你们就神经紧张。这些日子，无情的斥责声天天送入你们的耳中，你们天天心惊胆颤，你们不感到难受吗？你们怎么活得下去呢？

革命者就是孙猴子，金箍棒厉害得很，神通广大得很，法力无边得很，这不是别的，正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 ∞ ∞ ∞ ∞ ∞ ∞ ∞ ∞ ∞

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毛泽东

过去，工人打倒资本家，农民打倒地主，剥削阶级诬之为造反。无产阶级造反的帽子真是光荣得很！

今天，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等产生修正主义的东西，都完全消灭了吗？

没有！

各地各单位的黑线黑帮现在都完全消灭了吗？

没有！

现在消灭了黑线黑帮，将来就不会产生新的黑线黑帮吗？

不是！

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消灭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产阶级能不造反吗？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怎么能不万岁呢？

资产阶级的右派先生们，我们这群造反之众，有领导，有武器，有组织，有“野心”，来头不小，切不可等闲视之。

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

我们的武器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的组织是彻底革命的红卫兵！

我们的“野心”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撼山易，撼红卫兵难！

资产阶级的右派先生们，我们很理解你们的特殊心情：你们被我们专政了，你们痛苦了，你们也想喊一声“造反”了。无怪乎，最近出现了左派、右派齐喊造反的怪现象。老实告诉你们，珍珠不容鱼目来混杂。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日

∞ ∞ ∞ ∞ ∞ ∞ ∞ ∞ ∞ ∞

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古今中外的一切反动派说：剥削有理，压迫有理，侵略有理，修正主义统治有理，无产阶级造反无理。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最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把这个混蛋理论颠倒过来了。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革命的大造反。谁个是修正主义，谁个反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大造其反！

我们，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卫兵，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

对待革命的造反行动采取什么态度，是鉴别忠实于最高指示还是反对最高指示的分水岭。是鉴别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

你是革命者么？你就必然欢迎革命的造反，拥护革命的造反，参加革命的造反，一反到底！

你是反革命么？那就出于阶级的本能，就必然咒骂造反，反对造反，抵制造反，镇压造反。

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就是靠革命的造反吃饭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天天在造我们的反，你不造他的反，他就造你的反，骑墙搞折衷是不行的！对黑帮，对旧世界，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就得来一场革命的大造反！

一听革命的造反就心惊肉跳，就皱眉头，就暴跳如雷，就骂街，就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先生们，不是反革命就是糊涂虫！这些混蛋们，只准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不准我们无产阶级造他们的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真是岂有此理，欺人太甚！

造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传统，是红卫兵要继承和发扬的传统。我们过去造反，现在造反，将来还要造反！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就要造反！只要有矛盾存在就要造反！革命的造反精神，一百年需要，一千年需要，一万年一亿年还需要！

目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激荡的大风暴。红卫兵的战士们，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象勇敢的海燕一样在这场大风暴中翱翔吧！

红卫兵的战士们，我们既然已经把反造起来了，那么就一反到底吧！迎上前去，让革命的大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万万岁！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

【我看文革】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读《打老师的革命》有感

• 丁 白 •

一 也谈学生打老师

读《华夏文摘》近刊“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感触良多。我是作者的同代人，该文的许多观点都能从自己的经历中证实。首先是那场暴行的普遍性。我的家乡历来是“天高皇帝远”的百夷纹身地，但灾难并未放过那儿的中小学教师。其次，“红色恐怖”的始作俑者是由高干子女组成的所谓“老红卫兵”，教师被打的规模与程度直接与该校的高干子弟比例成正相关性。最后，刘邓派出的工作组虽未直接参与，但对暴行的发生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外，我想对王文略作补充。首先要指出的是，同一时期被打的对象并不限于

教师，还包括大批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当时由公安局向“老红卫兵”们提供这些人的地址，由后者深夜突袭，对他们进行抄家，毒打（有的在抄家现场被打，有的被押回学校的刑讯室毒打）。这些人的数量之多，受祸之烈，似乎远远超出了被打教师。只是他们大多是有所谓“历史问题”的“阶级敌人”，多数在事后并未象教师或当权派那样获得平反。虽然这种由执法部门与“民间”暴力集团联手进行的大规模践踏法律，草菅人命的行径在文明史上堪称绝无仅有，但由于政府多年的洗脑，一般民众只觉得是“好人打坏人”，属于活该之类。即使是幸存者本人也多噤若寒蝉，自觉胆虚情怯，对政府如今放他们一马已喜出望外，惶论“痛说反革命家史”。于是这段历史便成了一笔烂帐，在国人心目中变得与当年日本“支那派遣军”的兽行一般模糊了。

其次，据我所知，文革中发生的大规模迫害民众与知识分子的暴行主要发生在此期（后期虽有“清队”，“一打三反”等残民运动，但规模远逊此期）。因此，有必要对后人讲清谁是红色恐怖的罪魁祸首。遗憾的是，这一点对局外人来说远不是清楚的。尤其自张戎《鸿》一书问世并获得空前成功后，国外读者似乎已将文革中的一切罪行都与毛，四人帮和“红卫兵=造反派”牢牢联结起来，既不知道红卫兵组织的五花八门，更不知刘邓除了被迫害外，还在运动初期扮演过何等角色。

其实，凡过来人应该都清楚，造反派如今虽成了文革的替罪羊，与文革中迫害民众的罪行多数其实是扯不上关系的，与那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的实施更无缘分。如上所述，那场暴行的发动者与实施者是由高干子女组成的“老红卫兵”（简称“老兵”，以区别于后来的亦自称“红卫兵”的造反派或保守派）。毛泽东与陈伯达控制下的宣传机器催生了红卫兵运动。在清华附中第一个老兵组织成立后，毛立即以公开信支持，并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戴上红卫兵袖章向全国亮相，引起各地纷纷效尤。毛当时的司令部成员林彪，陈伯达，江青等人更在各种公开场合大赞大颂老兵“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历史功勋”，狂呼“好得很！！！”（此三字曾是红色恐怖高潮时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标题）。因此，正如老兵当时所说，毛是他们的红司令。司令当然应对其部下的兽行负全部责任。除此之外，后来在权力斗争中败北的刘邓亦难辞其咎。刘邓当时似已感到大祸将临，在其主持中央工作的短期内使尽浑身解数来保存自己，牺牲他人。他们除抛出各省意识形态主管作替死鬼外，更师法五七年的故智，力图“转移斗争大方向”，将文革搞成第二次反右，把祸水引向无辜民众。他们派出的工作组采取了“引蛇出洞，秋后算帐”的老战术，划定了大批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右派学生”，实行了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白色恐怖”。工作组撤走后，这些“牛鬼蛇神”即顺理成章地成了老兵们“砸烂”的对象。可以说，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实际上为“红色恐怖”完成了战略侦察的任务。

最后，我还想对这场暴行的社会根源略作探讨。记得当年有一段最高指示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生死搏斗的继续。窃以为这一论断是极其中肯的。文革是中共执政后一系列残民运动的合乎逻辑的延续与发展，其暴力本质是一以贯之的。文革中使用过的暴力手段，诸如批斗，游街，毒打，刑讯，“群专”等，均在以往的“镇反”，“清匪反霸”，“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拔白旗”等运动中不同程度地运用过。文革前的“社教”运动为其全面铺开作了小规模预演，“反修”歇斯底里，“学毛著”，“阶级教育”为其作了理论准备，而“阶级路线”的实施则作了组织准备。这一系列的铺垫工作，为早期文革训练出了一批前所未有的，经过最彻底洗脑的，“根正苗红”的狂热冲锋队。

因此，与王女士的困惑相反，我并不认为大批青少年是在一夜之间失却人性变为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这些豺狼是惨淡经营数十年的系统工程制造出来的。如果一种政治体系连知道“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天下”的封建帝王都不如，在执政后仍只知崇拜，讴歌暴力，蔑视，抨击，摈弃人性，良心，同情心，把人类有别于禽兽的一切美好情操都当作“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批判，以仇恨立国，以“阶级斗争”治天下，任意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划为假想敌而开除“人籍”，无端施以数十年的非人折磨与凌辱，它就只能社会化大生产出专门“痛打落水狗”，对“阶级敌人（即可囊括任何人的代数通项）决不心慈手软”，“象严冬般残酷无情

”的大批恶棍与歹徒。

“仇恨入心要发芽，流入心田开火花，万丈怒火燃烧起，要把黑地昏天来烧塌。”这怒火几十年烧下来，果然烧塌了社会的伦理基础，造成了空前的全民族道德大沦丧。如今，全民族心如死灰，朝野的唯一共识只是“中国人素质差”。上至庙堂股弘，下及贩夫走卒，人人万众一心，斩钉截铁地齐诵这六字真诀，仿佛那是万古不磨的真理，并由此发展出一种强烈的“同族互憎感”。一个民族如此轻贱自己，环球固找不到第二例，其没有前途也可想而知。眼下虽经巨额外资输血，刺激出一派金瓶梅式的荒淫无耻的末世繁荣，但整个民族既失去了内聚力，崩解也就只是迟早的事了。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内忧外患重重，几度亡国祸在眉睫，但从未面临过今天这种深重的精神危机。追本溯原，祸根埋在奉仇恨为国教的三十年中。

从这个意义来说，从刘少奇到大大小小的当权派，乃至若干中小学教师，在文革中无非是被请入瓮，饮下了自己参与酿制的苦酒。这么说或许有失厚道，但却不幸是事实。下文的故事就是一个小小的例证。文中所记是真人真事，只是主角姓名作了改动。

二 红领巾、小人书、电话、特务

1968年秋，两派武斗正酣，上山下乡尚未开始，我正在家中逍遥得不耐烦。忽有若干小学同学来访，邀我一道去见当年的班主任沈青箏老师叙旧，便跟着去了。

多年不见，沈老师依稀还是记忆中的模样，人似乎没有显著变老，只是一双眸子失去了昔日精明的光采。众人七嘴八舌地寒暄了一番，自然也免不得问到她这些年来过得怎样。听到这话，沈老师满含笑意的脸立即沉了下来，沉默了许久，才告诉我们她在运动初期受到资反路线的迫害几乎丧命，能活下来见到我们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话音未落便淹没在情不自禁的呜咽中。

“他们说我是黑模范，反动学术权威，这些，我都认了……模范，权威，总是事实吧……只是，我怎么会是特务呢？……他们的钢鞭材料，是说革命小将曾打电话来揭发过我和我丈夫是特务……关进牛棚没几天，我就跳了楼，摔断了一条腿……”

同学们都沉默了，屋里只听到她断断续续的抽泣。过了许久，沈老师突然止住抽泣，抬起头来，一字一顿地说：

“这个诬陷我的人，就是你们班的一个学生！”她那满含泪水的双眼牢牢地盯着我，目光似乎要刺穿我的灵魂。她整个人仿佛都化作了悲愤，坐在那儿宛如最后的晚餐时的耶稣。

我满面发烧，浑身冷汗，恨无地缝可入。屋里静极了，只听到远处断续传来的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歌曲。我虽然不敢抬头，似乎仍能感到同学们投来的一道道冷飕飕的鄙夷的目光。过了不知多久，我实在呆不住，找了个借口便讪讪地溜走了。

是的，这个打电话揭发沈老师的人就是我。只是……唉，……天哪！……谁知道，这么一个电话，竟会引出如此后果！

我从小就是个问题儿童，还在四年级，便当了一回“试读生”，离开除只隔薄薄一层纸。我们班原是个“放牛放马班”，因为老师频繁更换，课堂纪律之糟居全校之冠。历任老师都没给过我好果子吃，但只是在五年级时由沈老师接任班主任后，我才算是尝到了厉害。小学老师或多或少都是微型政治家，懂一套驾驭顽童的权术。在沈老师手上，这套“核心团结”，“分化瓦解”，“重点打击”，“孤立羞辱”的统战策略更是运用得出神入化。我这个死不悔改的顽童已是老运动员，对充当重点打击对象不仅责无旁贷，而且本应是饶有经验，胜任愉快的。问题在于沈老师对“群众专政”诀窍的钻研实有独得之秘，非一般俗手可比。上任伊始，她便慧

眼独具，看中了班上的头名好汉。此公不久前还与我同列“专政”对象，成绩操行一塌糊涂。但因年龄比同学大得几岁，往人群中一站即如鹤立鸡群，不怒自威。兼之好勇斗狠，全班没有一个不怕他的。沈老师大约是一眼就看中了他的威慑力，迅即将他发展入队，没几天又提为中队长。她在班，队委中也大掺砂子，换上了一批皮粗骨壮的生力，将这班人委以维持秩序，帮助后进的重任。由此，沈老师迅速取得对全局的控制，打开了局面。没过几个月，放牛班便拨乱反正，堪堪大治，以后更进而成了全区第一个红领巾班。沈老师的声誉自也不免扶摇直上，先后成了区里和市里的先进教师。

如果我当年头脑略为灵光些，看得出形势的无望，从此洗心革面，重新作人，也未始不能有条生路。只是我生来意志薄弱，怎么也改不了饶舌的毛病。每堂课听不上十来分钟，就难免由倦生厌，非与邻桌讲小话不可。这其实就是我这问题儿童的全部问题。于是，沈老师和她统率的群豪们便调动了一切手段，群策群力地来帮我解决这一问题。

手段虽多，无非也就是文武之道，亦即革命的两手。首先是利用红领巾来帮我建立荣誉感。我上小学那时少先队还没有后来那么普及。队员们多少有几分类似党团员那种上帝选民式的飘飘然。大约因为我的成绩还过得去，前任老师把关不严，竟马马虎虎让我在三年级便打进了组织。红领巾在我脖子上飘了一年多，哪怕在我当“旁听生”时也没有给过我甚么麻烦。在沈老师治下，它却成了我无穷惶恐，焦虑，紧张的源泉。不知有多少次在我闯祸之后，沈老师总要把我当着全班叫到讲台上。

“你脖子上戴的是甚么？”她无比轻蔑地看着我。

“.....”

“说呀！”她一把揪住红领巾左右摇晃，“它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你自己说说，你配么？”

“.....”

“解下来！！！”大概益加为我的沉默激怒，她怒吼了，“神圣的红领巾不容你这种害群之马玷污！”

我噙着泪，颤抖着双手解下红领巾。随着它被沈老师一把夺去，我的心里也似乎失去了什么，仿佛在大庭广众之前被剥光了衣服，无地自容，茫然失措。

这之后，便是无穷的焦虑与担忧。我掐着指头算日子，不知道沈老师会不会在下次全校队活动前把领巾还给我，免掉一番更大范围的难堪和羞辱。随着队活动日期一天天的逼近，焦灼变成了恐慌。期待中的灾难远比现实中的更令人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白天，我留神窥伺沈老师的一颦一笑，力图琢磨出其中对我的前途的暗示。夜里，我向“南无斗战胜佛”，关圣帝君，岳武穆，豹子头林冲等刚从书上看来得诸路神道祈祷，求他们发大慈悲，施大神通，移开那柄达摩克利剑……一条小小的领巾捏在沈老师手里，竟有着“帽子拿在群众手上”一般的妙用，那就是让你永远生活在悬念的折磨里，不知道等在前头的到底是福还是祸。

偶尔也有时来运转的时候。有时区里组织作文或算术比赛，我被“限制，利用，改造”的机会便到来了。这时沈老师总要把我召去，指出比赛的重大意义与参赛的光荣，并说明虽然我毛病诸多，组织上还是愿意给我一条出路。如果我能带罪立功，前途还是光明的云云。最后把领巾发还，以彰信守。这时我总是又感激，又惭愧，又激动，含着眼泪系上领巾，向她庄严保证誓为集体争光，肝脑涂地，死而后已。只可惜自己笔头实在不争气，到小学毕业时我仍是待罪之身，并未为集体立过一星半点的功劳。

如果说红领巾是虚的，头名好汉兼中队长的拳头却再实在不过。这一点，我周

身的神经元有痛切的体会。有两条理由使得中队长酷爱帮助我并从中获得巨大的乐趣。首先，我在班上年龄最小又最为潺弱，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打起来有无穷快感。其次，他是老师的心腹，我是老师的头号打击对象，痛打我这落水狗是替天行道，奉旨除奸，既无事后受罚之虞，又能得到道德上的满足。从他那儿，我第一次认识了一条肤浅的真理：打人一旦加以半合法化，合法化，甚或权利化之后，便不知伊于胡底。因为他的行径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恶童的欺凌：有一次他竟用半截城砖砍青了我的一侧肩膀。这说明他是兢兢业业对待自己的职务的。

大概是我这个人实在不堪救药，上述文武之道居然没有奏效。终于有一天，沈老师向全班宣布我已无从挽救。作为对我的最后惩罚，她宣布对我实行孤立，命令任何人不许和我讲话或接触，禁令由中队长等人监督实施。

以后的日日夜夜实在是不堪回首。旦夕之间，你惊恐地发现自己不复存在，仿佛变成了一个孤独的幽灵。周围是笑语喧哗的人世，但一切与你绝缘，你怎么也走不进去，宛若活在醒不过来的噩梦中。绝望中，我甚至盼望沈老师象从前那样在课堂上痛骂我。但她似已决定注销我的存在，即使偶尔向我那个方向看过来，目光也总是笔直地穿过我，仿佛我是一团空气。孤立令下达后一周，我便频于精神崩溃：孤独，惶惑，自卑，自责，自伤，屈辱，悔恨，羞惭，内疚，委屈……各种各样复杂的感觉交集在心头形成巨大的骚乱。当中队长有次偶尔忘了禁令又对我老拳相向时，我感激得几乎拥抱了他！这一切在我那幼稚无知而又无比敏感的心灵中投下了终生难以去除的巨大阴影。十多年后当我读到白桦“难为阳世鬼，羞作阴间人”的诗句时，仍能感到强烈的震撼与深深的共鸣，尽管余生也晚，既未忝列右派，亦未荣任牛鬼。

不知是哪尊神灵起了感应，我在快要发疯的时候忽然绝处逢生。这一次是沈老师的新近挣来的名声救了我。区教育局要在我班举行观摩教学，她需要若干好手在课堂上应答如流，而中队长那班在政治上过硬的新贵们对此爱莫能助。于是，我又一次得到被利用改造的机会，孤立令就此解除。六年级上学期期末考，我侥幸得了全校第一，校方发了奖状。沈老师竟破天荒向我露了一次笑脸，把红领巾发还给我。毕业在望，看来我逃出生天已有了指望。谁知没几天我又闯下了大祸。

寒假一过，我就兴冲冲地回到同学中。我珍惜刚得不久的接触权，急于向他们露一手，便得意地向他们展示了我的杰作：一本小人书上的人物被我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再创作。其中我最自豪的是一个角色手持小枪，一枪正中另一角色的屁股。

杰作引起了预期的轰动。同学们争相传阅，竟把它带进了开学典礼的会场，人群中发出阵阵哄笑。负责维持秩序的班干立刻没收了小人书，把它交给了沈老师。

散会后我立即被召到她的办公室里。虽然我多次在类似的场合来过这儿，但这次气氛完全不一样。我一进屋就吓住了。

“这是你干的吗？”她脸色铁青，把我那幅得意之作摔在我面前。

“是……”

“这是什么人？”她指着持枪的角色喝问。

我定睛一看，头嗡的一声胀大了。原来那持枪者是一个地主，而尴尬处负伤者却不幸是一名土改工作队员！

“你……你反动！……”沈老师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虽年幼无知，也早已知道“反动”是什么意思。孩提时代的模糊记忆中，就有一车一车的人被拉出去枪毙。先在城里游街，前有雄壮的军乐开道，高奏“镇压反革命”的乐曲，那景象蔚为壮观。昏天黑地之间，只觉两股热流直取括约肌，斩

关欲出，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哭声中只依稀听到沈老师果断地发出一系列命令，命令立即召开班会，对我的罪行进行批评（那时还未时兴“批判”的行话），并宣布开除我的队籍与学籍，同时令班干把我的家长召来把我领回去。

母亲气急败坏地赶来时，班会正在高潮中。母亲在教室外战战兢兢等了半个多小时，耳闻同学们一个个义愤填膺的发言，心里越来越急。好不容易到得散会，沈老师怒气冲冲地走出教室，她赶快迎了上去。

“老师……”她陪着笑脸怯生生地喊。

沈老师面色铁青，头高傲而坚定地扬起，目不斜视，大步流星地从母亲旁走了过去，仿佛在身体力行鲁迅的警句“最高的轻蔑是无言的轻蔑，而且连头也不转过去”。

如果不是家人找到了在区教育局作小员司的一个远亲，我的学历说不定就此画上了终止符。幸得如此，沈老师才法外施恩，让我混到毕业，只在我的毕业评语中写了一条“政治立场不坚定，大是大非观念极为模糊”。这条鉴定也写在我的少先队队籍表中，不知后来是否放进了我的档案里。好在那时年纪小，对这些深文周纳的“诛心之论”压根儿就莫测高深，自然也就没往心里去。也算是后来运气好，进中学后虽顽劣如故，却再未碰上具有类似政治敏感的老师。不走运者当然大有人在。一位同学初中毕业后档案里竟塞进四十多条反动言论。另一位高班同学高中毕业鉴定则是“此人口是心非，两面三刀，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万万不可信任”。两人从此失学，屡屡谋职不成。直到1967年批刘邓资反路线公布黑材料时才明白华盖运的由来。

就这样，离开小学时我恨透了沈老师，怨恨之中还隐隐夹杂着鄙视。我忘不了每次公开教学前她总要彩排多次，将要进行的课堂提问的标准答案写在黑板上让一批挑出来的好手背熟，并一再叮嘱全班，到时一定要全体举手，不会的也不必担心，只管举手，她是不会点他们的。期末考前，她总要出满满一黑板题，将考题杂以其间，附以标准答案，令学生练熟，不熟不许回家。这些作法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疑问，觉得正是她平时道貌岸然不遗余力地加以痛斥的欺骗行为。进了中学没几天，我的怨恨与鄙视便得到了发泄的机会。

校长办公室外有一个小小的电话亭，师生们可以在那儿免费打电话。当我们这些新生中的调皮鬼们发现这一秘密后，它便立即让我们走火入魔，如痴如狂。这是我一生除矿石收音机外第一次接触到的近代发明。由于它是供在公有制的神圣祭坛之上仅次于轿车的神物，仅仅拿起话筒这一事实便足以使我飘飘欲仙，不知今夕何夕。何况答话者总是彬彬有礼，一本正经，这更让我们这群习惯于大人的粗暴呵斥与白眼的顽童们如乍膺九锡。开始，我们只是打到问询台去问时间，打到气象台去问天气。但这种特殊娱乐的局限是“礼不下庶人”。用完这些有限的话题与对象后没多久，我们顽劣的本性便暴露出来了。我们开始打到影剧院去包场，冒充气象台打到砖瓦厂去通知他们“今天有九到十一厘米的大雨”（那时我们以为砖瓦是在露天生产的），最后便发展到打电话回母校去辱骂老师。

顽童朋友们大多与我有类似感受，对当年的老师切齿衔骨，因此在不知是谁出了这个主意后，立即欣然而从。为防对方听出声音，来自不同学校的人便结成一帮一、一对红。我按搭挡口授的台词找到他的老师，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恶骂，骂她是只知扔炸弹，放鱼雷的轰炸机，鱼雷艇。骂得对方满头雾水，浑不知只因她一度怀孕生产，便在所教的顽童学生中落得了这么一个恶名：在那时儿童的心目中，结婚，怀孕，生孩子乃是世间第一可耻之事。我给搭挡的台词与军火无关，却更具杀伤力也更刻毒。我让他冒充公安局打到学校，说沈青箏和她男人都是特务，我们马上就要来抓她了。在我心目中，特务是最高级的骂人话，用起来远比飞机快艇一类解气得多。沈老师的丈夫虽从未谋面，但据说有同学曾见到他戴着墨镜和沈老师一道在街上走。那时肃反电影看得正多，深知凡戴墨镜者都是如假包换的特务，这就是

我的灵感的由来。

我们的胡闹当然逃不出成人的眼睛。几天后，我放学回家，路过母校时被校长和一位男教师截住。有趣的是，他们也用公安局来吓唬我。校长疾言厉色地说，我们是在犯法，公安局已完全掌握了我们作案的情况，倘再不悬崖勒马，公安局就要逮捕我们了。这番话真吓破了我的胆，从此我再没敢走近那个电话亭，路过母校时也总是绕道而行。这番胡闹当时似乎也没给沈老师带来什么困扰，后来她还似乎越来越红。我上高中时在省报上见到有关她先进事迹的报道，题图照片摄的是她在课堂上提问，慈祥地微笑着面对着一片如林般高举的手臂。那时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的那个电话，竟在多年后被引爆，成了几乎炸得她粉身碎骨的定时炸弹。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昔时的儿曹恩怨，早已云散烟消，留在心头挥之不去的，只有对当年闯下大祸的歉仄与内疚。重提往事，只是想解剖这只麻雀，从中抽出具有全局意义的东西。70年代初雪夜闭门读禁书，觉得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振聋发聩，对之无任钦服（因该书未附作者照片，未见老先生戴墨镜的尊容，还不知道他是如《华夏文摘》转载文章检举的中央情报局（战略情报局？）的特务）。只是书中将先贤探讨了几千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贬为逻辑学上毫无价值的连锁推论法，对此期期不以为然，觉得毕竟是鬼子，难免有胶柱鼓瑟，昧于国情之处。在我看来，中国社会是一幅一元化的全息摄影，每一颗露珠都反映了红太阳的光辉，任一规模的社会单元都按“专制—臣服”的原则组成。上至九五之尊，下逮乡野匹夫，人人是无师自通的心理学大师，深谙一套残忍无情的文韬武略，用来扫荡对手，压制个性，摧毁自尊，磨掉棱角，以使治下人人俯首归心，不胜受感恩战栗恐惧之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红领巾班正是一座完整的锦绣中华的微型景观，而我颈上红巾的攸忽来去，与“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点灯封灯，以及我党的“从宽从严”“政策攻心”，均具同工之妙。沈老师当年因我的恶作剧几乎把我打成反革命，数年后却又因我的胡闹被货真价实地打成特务，说来似是蹩脚的黑色幽默，又似“太上感应篇”式的廉价因果报应，其实不过是全社会将她本人也谙熟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韬略发挥到极致的必然结果。

□ 寄自英国

∞ ∞ ∞ ∞ ∞ ∞ ∞ ∞ ∞ ∞ ∞

文革是什么

• 谢 友 •

“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毛泽东：《中共中央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赫鲁晓夫是谁？“中国的赫鲁晓夫”又是谁？甚至张春桥、戚本禹这样的大红政客都不晓得毛泽东心目中的“赫鲁晓夫”是党内何人，更何况我们这些毛毛小孩。

我们是“老三届”大红卫兵的弟弟妹妹，有些文学家把我们称为“红卫兵次生代”，更有一些社会上的牛皮子把我们定性为第“六代半”，使我们成为“无代可循”的人。我们这些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降临到这个世界的人，生下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就待业，在那些文学家的眼里，竟然是“无代之人”。把我们划归为“六代半”者认为，红卫兵、知青列为第六代，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是第七代，而我们这批人只能当三明治夹在中间，就连享受“四舍五入”的优惠也没有。

历史也的确忽略过我们这“半代人”。文化大革命，当我们的哥哥姐姐在社会上冲杀时，我们还是一群不大懂事的小孩。街上若有游行队伍，那里看热闹的肯定是我们。在“派”性上，我们也总站在自己的哥哥姐姐那边，觉得他们肯定是“左”派。他们个个伶牙俐齿，能辩善驳，常常把大人搞得哑口无言，这确实令我们敬

佩不已。我们只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用票证的年代。那时候，除了水和空气以外，什么都凭票凭证。记忆中，我们的爷爷或奶奶出门购物时，携带一堆票，油票、肉票、鱼票、布票，竟然有盐票和酱油票。尽管有票，但购物还得排队，有时购物者的队伍比起古时中国的龙还要长。上课时，不知怎的，看到老师的粉笔字一天比一天粗，经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我们缺少“维他命 ABCD”。那年代，我们不但没有肉吃，也没有菜吃。真正的“穷过渡”。

我们的哥哥姐姐们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自愿“上山下乡”，到广阔的天地去的；而轮到我们的时候，尽管再三批判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但“变相劳改”的风凉话常响耳边，挥之不去。令我们记忆深刻的毛主席语录，当属《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上学很轻松，因为没有正规的课堂教育，而且学制也从“六三三”改成“五二二”，只要读九年书，就可以高中毕业。学工最好玩。到工具厂去学习，尽管要接受工人“老大哥”的训话，但可以趁师傅不在时偷一些铁片回家做玩具。学农最惨。在田地里插秧，这腰一弯下去，从太阳当顶到太阳西斜晒屁股没直起来过。种菜、割稻、撒农药，样样都干过。学军最没劲，整天听连长讲革命故事，还得挺直腰板站在太阳底下操练。“一二三四”，走路都得听人指挥。谁说书店里没卖书？书店里卖的尽是“红宝书”。那是一个文化贫瘠的年代。样板戏的唱腔和《红太阳》的主曲，是我们唯一听到的旋律。我们在《地道战》中爬滚，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中长大，那时没有《红与黑》，也没有“安娜·卡列尼娜”，我们向往北京，同时也向往地拉那。我们的人生简直是一部黑白故事片。我们生长在一个无知和盲从的年代，也难怪这“六代半”中不能出什么伟大的政治家，尽管有七十年代的黄帅、八十年代崔建、九十年代的葛优，但他们确只能潇洒一回，毕竟与“书本”和“知识”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从我们开始记事起，学校就被一片“万岁”和“打倒”的声音笼罩着，我们喊了太多的“万岁”和“打倒”，以至于自己有时都分不清楚，自己到底喊了些什么。也因此常常会出现一些“反革命标语”的冤案。那时，我们经常停课闹革命。不懂得阶级斗争是什么，反正，大人讲了，我们也跟着“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越是穷的地方，阶级斗争越波澜壮阔。反正中央说了，穷是坏分子搞成的，穷日子过多了，揪些坏分子来斗斗，也许会富裕起来。文革后期的“池恒”和“梁效”，尽管笔杆有力，“点石成金”，但我们真正弄懂的还是很少。到了一九七七年的高考恢复，哥哥姐姐们因“苦大仇深”，倍受注目，而我们只能当“跟屁虫”。“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在书店里受人青睐。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属于大哥大姐，他们太伟大了，把我们这“六代半”人的身影全部遮住。不过，历史也给我们留下了叱咤风云的机会。承蒙邓大人的恩准，我们可以加入“世界大串联”的队伍。相当数量的“六代半”人，嫌弃国内的气氛太糟踢读书人，有知识的都跑到海外来个大会师。据统计，在“洋插队”中，“六代半”人获博士、硕士头衔的最多。我们成为未来中国的人才库。

□ 转载自《真言》电子版 9 6 — 0 1 总五期

~~~~~  
【往事追忆】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疯 长

• 王小京 •

—

我出生于 1 9 6 3 年，喝着文革奶长大。

偶然碰到儿时的邻居叔叔阿姨，他们总夸我小时候聪明，“能背诵所有毛主席诗词和老三篇”。那时我应该三、四岁，据说我本身就是节目，永远不厌其烦地为任何人背诵，来者不拒。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过自己的背功。我猜毛主席诗词和老三篇对于三、四岁的我来说，是水果糖或者糕点。

当时我在北京市府大楼附近的幼儿园，玩伴中一对双胞胎的名字很好记，“东方红”和“太阳升”，没姓。她们的父母给她们起这等名字，至少能起到某种意义上的保护作用：欺负她们，谁敢？

一次在大街上，母亲突然一把把我拉到墙边，以免被奔跑的一群人撞倒，他们追赶上他们的猎物——一个年纪挺大的人，一片嘈杂。他是给他们架走的，除了几块砖头和折断的木棍外，地上还留下几滴血。

我跟着母亲参加过一次卫生系统的批斗大会，在卫生局楼前。口号声响起，我吵着要抱要看，母亲不抱。跑到另一边，一个邻居叔叔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我看见台阶上站着一排挨斗的人，一律低头，每位有三人执行：两人反押双臂，一人立后揪着挨斗人的头发。我当时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反正听到哪里开批斗会，我经常要去看，就象现在的孩子去动物园。

搬家后，我转到北京西郊一个军队大院的幼儿园。搬家其实一点没有意义。母亲是儿童医院的大夫，当时在房山下放，喂猪；父亲是军人，在地方上“支左”，几乎不回家；妹妹被寄放在永定门附近的人家，我简直就是幼儿园的永久居民。周末我不孤单，十几个孩子缠着厨房李大爷，他是老红军，一讲故事就是长征时怎样把皮带煮出香味。我们没饿过，想吃红烧月亮李大爷也给做。

我们学跳舞和唱歌，跳过一种西藏长袖舞和带翻跟头动作的红军舞，唱的歌多为样板戏，因嗓子不好老师只让我演刁德一。每次演出完能得到一包饼干，自己经常买我知道，两角钱一包。我们也画画，大院报社的美编叔叔当着大家的面一会儿就画了一幅刘少奇漫画，之后加上的叉子好象用的是红蜡笔。我羡慕极了，因为我画半天也不象。我发觉画画是件令人激动的事，我的习作不断出现在纸上、墙上、马路上，有一次竟是在一个弱小的男孩罩衣上。我善于使用彩色铅笔和蜡笔，粉笔不好掌握，不鲜艳。

然而，每星期六别人被父母接回家时，我知道我在盼望什么。

偷着跑回家好几次，门永远锁着。一次例外。那天远远看到母亲背着大行李卷刚进楼门，我兴高采烈一头冲到家，却招来一顿打，原因很简单，我不能在父母不在家时“开小差”，因为我已经被“交给”幼儿园了。

随后跟母亲去乡下呆了些日子。猪场在那个村子一角，养着数不清的猪。每天清晨当我睁开眼睛时，母亲已经把猪饲料煮好，用那种直径一米的锅。母亲拎起盛满饲料的桶，招呼我一起去。我喜欢看猪们津津有味的吃相。

村里经常派人来起圈和送干饲料。据母亲后来讲，喂猪是当时最轻的农活。有一次母亲和大队兽医给头病猪治好了以后，憨厚的大队书记才知道母亲是大夫。派人从北京买来针灸针，请她作赤脚医生。母亲出身于中医世家，但只受过西医教育。她想试着学。那个印有语录的黑色皮夹里有几十枝针，短的连柄四厘米，长的有十几厘米。几天后就有妇女队长愿意在自己胳膊上试针，母亲说，没有消毒棉。她看到过我用所有针给一个大萝卜扎。

母亲在回北京前的半年，成为大队专职赤脚医生，不仅学会了针灸，还会配中草药和号脉推拿。我牙疼，怕门诊部的钻头，母亲一针虎口穴，顿时见效。乡亲们对母亲非常尊重，总帮我家劈柴挑水，我惹了谁家孩子，这孩子回家反会挨打。以后许多年一旦有乡亲上京城都提一篮鸡蛋来我家。

## 二

71年我上小学。小学在大院附近，报到是被邻居领去的。我们那时不叫年级，叫“连”，“一连”就是“一年级”。我被分到“一连二班”。我们的教室右上角有一个方盒子喇叭，每天听数次广播。音响效果不好，我过两个月才听懂里面说

的是什么。课桌上摆一摞课本，最上面放袖珍红宝书，老师进来后，班长令“起立！”，我们要迅速拿宝书按老师说的页数翻开，念上一段，这都是六连大姐姐告诉的。我们认字不多，基本上是将宝书用右手贴至胸前，背诵口号。“要斗私批修”和“要复课闹革命”是我新学会的口号，虽然并不知道涵义。

我们班很快有了“标兵”，是一个象猫一样的女孩。她的最大优点是上课双手背后，一动不动。“五好战士”、“优秀红小兵”和以后的“三好学生”与我无缘，我连哪“五好”也不知道。几乎所有事情都和军事有关，操练是每天的节目，喊口令很绝，普通话的不行，要那种“口令语”，稍息读“烧洗”，立正读“里争”，齐步走是“期补，揍”。我最喜欢报数，每次都有好玩的发生，说出自己的数字时立即头向左转，下一个接着，数到十以后就难了，总错，一片嘻笑。我没出过错，生来个小，只喊“一”。小个子排第一是不符合军事要求的，我多年后才发现。班上军队子弟多，有人还能维妙维肖地走段正步呢。我们不比谁爸的官阶大，杠杠星星早没了。我们愿吹嘘自己的爸爸打过仗站过岗，站岗其实很普通，但我们羡慕那端枪的神气劲。顺便提一下，我的所有玩具除了一台自制老吊外，都是“准军事物资”：手枪、杆枪、冲锋枪、红樱枪；望远镜、坦克、军舰；子弹壳和武装带都是真家伙；“军事扑克”的大小王分别是司令和副司令。

第一个班主任田老师学过师范，很受我们欢迎，她生小孩后调走了，韩老师继任。她是随军家属，认字，也爱说，没完没了。韩老师说话难懂，管“脚丫”叫“脚片儿”。让我不能忘怀的是她总忘记留家庭作业，省下不少功夫。她的拿手好戏是传达重要消息，告诉我们林彪摔死了，但不许对外国人说(当时已有少许外国人到公园名胜游览)，让我们都宣誓。批林批孔时她改教唱歌，不会弹琴，清唱那种。有一首歌的开头是这样的：“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一个想复辟，一个想复礼。”她教一遍就有人能跟着哼，原因是歌曲本身没旋律，念词时带点河北方言就齐活。她把“复辟”这个词读“复屁”，“和屁有关的能有什么好事？”，她的反问引我们哈哈大笑。她指着窗外操场上推单轮车运煤渣的干瘪老头说他就想复屁。干瘪老头原来是校长，文革被打倒后一直留校监督劳动，若态度不好，据韩老师说，就让他把煤渣运到垃圾堆以后再运回去，如此反复。他后来又当了副校长，主管环境卫生。他的声音出现在学校广播里，几乎永远是句呼吁：“厕所堵塞了！”我们班有一个坏小子在副校长后面用柳条赶他，被传达室杨大爷扇了一耳光。杨大爷追到我们班瞪着眼睛喊：他工人阶级谁都敢打谁都不怕，韩老师一句话没说。

韩老师有个发明，叫作“背对背揭发”，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变种，每月都做一遍。具体做法是：学生每人写自己和别人的坏事和错误言行。“包括其他老师和我自己！”她强调。署自己名字后上交给她。韩老师在讲课时经常能不点名地列举谁的劣迹，并且坚定地说这坏家伙就在班内，顺着老师的目光大家互相瞅着，曾做坏事的如果诚恳一定低头和红脸。也不知哪个狗东西把我七岁半曾在人家菜窖里撒了泡尿的故事透露给韩老师，以至于以后谁说“菜窖”大家就直看我。

我学习不错，算术、图画老师最喜欢我(我当过唯一的“班”级干部是数学课代表)。我害怕看到韩老师严厉的目光，更害怕这目光变成“慈祥”。她微笑着说请我母亲晚上去她家，我就知道大难要临头。母亲晚上快九点才下班到家，赶去老师家后我至少挨母亲一通训斥，韩老师那时的目光就更显慈祥。

我们那时候的课余活动？贡献型的有捡粪、捡树叶和捡废钢铁。捡废钢铁有时就是偷，马路边的井盖几人抬起一摔就碎，我们班捡的份量最重。惊险型的是打架和钻地道，我挨打次数相对多些，地道有时钻着钻着就迷了路，甚至拐进下水道里，太味儿。还有赌博型：弹球是赌具，子弹壳充赌资；烟纸的赌具是我们的小手。弹球游戏我琢磨出经验，赢的子弹壳堆满床底。一次有人抓了只野猫，我们把它倒吊在树上，学着电影里坏蛋或鬼子的口吻和动作，“往死里打”，谁的奶奶蹈着小脚跑来，骂我们是遭天杀的，我们一哄而散。年龄大些的坏小子一般十五、六岁就被他爹送去当兵，几年后都算出息。

我至今仍相信，小学时代上课只是基本持续的副业，主业是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走廊的墙壁上总有大字报，老师写的都是连笔字，不好认；学生的作品狗爬类

居多，一般写不出什么货，照抄报纸。我红模字没练仨月，也被选成大字报“抄手”，有次连拔草劳动都免了。

“反潮流”是我印象中投入较多的政治运动。我们班好几人秘密商量给韩老师贴张大字报，因我是抄手，让我旁听。大家控诉半天，也不知怎么动笔，因为她从未打过我们，无奈，只写了一句标语：韩老师是个坏东西！！落款的主意是我出的：全校革命师生。我们犯的错误现在看是既没讲事实也未讲道理，标语很快就被别的故事覆盖住了：地理王老师曾摔断刘小军的铅笔，因为刘小军把笔夹在下唇下。老师称他做怪样，刘小军辩他正在思考，至少老师违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地理王老师哭着给那个坏小子送来一打新铅笔，我突然听到刘小军也哭，说不是老师错是他错。我算糊涂了。真闹。

“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我们“戴帽”初一。天安门事件第二天，小丽交给校广播站一篇听新闻和看报纸的心得，马上播出。我们班出了政治明星，她当上“队”级干部。我们编排的一个批判邓小平的三句半获得街道联演的头奖，站在商店前面的台子上，我们又给工农兵们加演一场。

我们还不断受过学习雷锋的号召，做好事。做好事也可以，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被要求不顾家地为班集体做好事。张国典的父亲是大院大轿车司机，他做好事的方法是在学校春游时让他爸爸出车，每次都得到老师夸奖。他爸爸一次因执行任务没来，他觉得自己没脸见人，竟从大院偷来一辆大卡车，老师问司机叔叔在哪，他嘿嘿指自己。春游没成行，他父亲受了军纪处分，他在挨他爸一顿暴打后成为我们崇拜的英雄，十二岁的飞车大师。

不顾家，对我们来说就是不顾父母和姊妹和自己。我们发现所有报纸上表彰的英雄模范榜样都把自己的家折腾得够呛，家人生病还是死亡他眼不眨家不回；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差不多都死了。雷锋、王杰、欧阳海、焦裕禄。按说雷锋叔叔做好事又不是一年两年，人家死之前怎么不夸夸？

劳动当时叫开门办学，我们很开心。走出去：来回路上一律打红旗齐步走，到附近的农村抢收过大白菜，踩过麦苗，还三夏过，所到之处鸡飞狗跳。刘小军逗狗，狗急，他没站稳掉进粪坑，差点出人命。我们干的农活农民大伯还要返工，都忙。请进来：贫下中农上讲台。这可绝。教我们认认什么是害虫和忆苦思甜也好啊，偏不，要讲数学和语文。讲不下去，就唱歌。楼里歌声此起彼伏，我们不认为隔壁教室的歌声比我们嘹亮，贫下中农铿锵出一句：“给他一大哄啊”，我们更铿锵：“啊哄，啊哄！！”

76年毛主席逝世，学校设灵堂，一片啜泣，尤其是女老师和女生，弄得我也跟着热泪盈眶。派我守堂，没人的时候我无聊地把一株万年青的胖胖叶子上刻满小人和动物。

小学毕业我们都没有得到什么证书，一走了事。那天学校的玻璃碎了至少三十块。

### 三

小学生活其实是最模糊的记忆，但和文革或许能沾些边。

文革故事曾被编入相声和传闻，大家听后一笑了之：那时，唉，就是那样。想过没有，多少人跟着发疯？自己是否有责任？

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也许不必为文革负责，但不了解文革也就不真正了解我们。是否要为自己负责？是否要为他人为未来负责？

家境好、没有尝过生活艰辛的一批人，假设成人后没经过深刻反省，很可能有这样特点：因当时父母没时间，而孤独傲慢缺少家教；因当时全国都疯狂，而野蛮

残暴不讲道德；因过后政治遭冷淡，而看破红尘自私没有责任感；因现在全民皆商，干脆没心没肺地捞。

有人说这批人是在国外拿学位最多的一群，除了这批人赶上个好时机外不一定能说明什么问题。受过高等教育或超高等教育，该懂的必须懂的他未必就真懂。

□ 1996.2.13. 郝军提供

---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

本期责任编辑：[华新民（美国）<cn-dm@cnd.org>](#)  
本期 校对：[若原（美国）<cm-col@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黄银荣（美国）<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姚明辉（美国）<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萧同（美国）<cnd-cord@cnd.org>](#)  
《CND》总编：[温冰（加拿大）<cnd-manager@cnd.org>](#)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SUB（或 SIGNOFF）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SUB（或 SIGNOFF）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ftp.cnd.org\[132.249.229.100\]](#)：pub/hxwz  
（加拿大读者可用：[canada.cnd.org\[142.132.12.100\]](#)：pub/cnd/hxwz）  
（欧洲读者可用：[europe.cnd.org\[132.199.1.203\]](#)：pub/doc/cnd/hxwz）  
考访服务站（Gopher）：[cnd.org](#)（中文或英文目录）  
万维网服务站（WWW）：[http://www.cnd.org/](#)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本期编辑用软件：XLBR2.0 ©严永欣 NJSTAR ©倪鸿波  
GBLIST ©陈公权  
本刊同时采用 ZWDOS ©魏亚桂 中文软件处理日常编务

---